

纳粹屠犹与犹太民族的现实主义转向

汪舒明

内容提要 对于犹太民族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对权力的认知和态度而言,纳粹屠犹显然是一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纳粹屠犹改变了流散史上犹太人对权力的消极态度,以强权自助地保障犹太民族的安全成了许多犹太政治学家和神学家的现实选择。纳粹屠犹发生后,犹太民族整体上转向锡安主义运动,而且锡安主义运动本身也变得更加激进。纳粹屠犹也改变了美国犹太人的自由同化主义立场,使他们急剧转向锡安主义。在美国锡安主义阵营内部,激进的政治行动主义路线迅速取代了慈善事业式的温和保守路线,将锡安主义组织改造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纳粹屠犹成为塑造当代犹太民族社会政治特征的重要历史基础,导致其“重归历史”,推动其明显的现实主义转向。

关键词 纳粹屠犹 犹太民族 现实主义 权力

纳粹屠犹(Holocaust)给犹太民族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创伤和历史阴影,业已成为犹太民族认知人类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棱镜。在经历了二战后初期相当长时间有意或无意的回避后,犹太民族对纳粹屠犹的记忆、研究和反思随着艾希曼审判等事件的发生而开始涌现,并使这一历史记忆不断内化。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是增强这一历史记忆内化的关键。这场战争将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的孤立无助感和对灭绝的恐惧感再次带给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则使犹太民族完成了一个从毁灭到重生、从灾难到拯救的历史进程。因此,这场战争是以纳粹屠犹为起点的犹太民族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掀起了持续至今的研究和反思纳粹屠犹的热潮,进一步使这一事件内化为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对其集体意识和认同产生深刻影响。对犹太民族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对权力^①的认知和态度而言,纳粹屠犹显然是一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它导致犹太民族“重归历史”,唤起以民族权力求生存和安全的强烈渴望,推动其明显转向现实主义。

一、犹太民族权力政治观的兴起

犹太民族在古代曾拥有权力,并发展出了相当系统的权力学说。但随着大流散的开始,犹太人失国离乡,散居各地,丧失了凝聚民族意志以建立政治权力的基本条件,缺乏权力成了常态。处于无权状态的犹太民族难以把握自身的命运,也无法以其民族意志改变历史进程,从而被视为“撤出历史”的民族。由此,犹太民族反身向内,致力于寻求精神升华,而非政治自决和民族自立;权力渐渐被犹太民族视为腐蚀灵魂的“恶”,而无权状态及其带来的苦难反被视为一种有利于犹太民族彰显其“神选性”的美德。“加路特”(Galuth,意为“放逐、苦行和赎罪”)和“苟拉”(Geullah,意为“从放逐中得到解救并回到祖先的土地”)观念就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对权力的消极倾向。这两种观念

^① 本文所说的权力(power)是指一个政治单位以强制或非强制的手段对另一政治单位的意愿和行为加以控制的能力。就包括民族在内的任一群体而言,将其成员凝聚起来,形成集体意志,成为一个组织化的机体,是其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

使犹太民族将流散中的苦难视为神圣拯救到来前的惩罚和赎罪,全都出于神意。流散地犹太人通常展现出和平、温善的特性,显得敏感、怯懦,厌恶兵役。^① 谦恭地服从、使自己对当地统治者有用并获得保护、在必要条件下成为殉道者、与主流社会文化相分离等办法成为他们应对外来压迫时常用的策略。^② 法国大革命后,犹太人在中欧和西欧国家陆续获得了“解放”,这些国家的主流社会依据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精神开始允许犹太人参与社会政治。深受鼓舞的犹太人积极加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期望进一步打破社会樊篱和主流社会能够进一步接纳犹太人。“社会正义”成了犹太人的普遍诉求,甚至许多人为了融入主流社会并享受平等和自由不惜放弃犹太身份。与欧洲其他民族相比,犹太民族主义^③ 姗姗来迟。

纳粹屠犹既打碎了流散地犹太人正统派等待弥赛亚来临实施拯救的迷梦,也重创了犹太自由主义者期待获得“解放”并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景。犹太民族生存问题在许多犹太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不少犹太知识精英从纳粹屠犹这一历史悲剧中找到了拥抱权力的理由,转向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成为现实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④

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1946年出版的《科学的人和权力政治》一书和1960年在利奥·贝克学会(Leo Beck Society)所作的题为“德国犹太自由主义的悲剧”演讲中,猛烈抨击了二战前犹太知识分子中盛行的自由理性主义,拒斥了启蒙神话。^⑤ 在《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第一版于1948年出版)一书中,摩根索批判了建基于19世纪启蒙理性的“科学乌托邦主义者”的“和平科学”。他将权力置于政治学的中心地位,并认为权力欲源自人性,争夺权力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在时空上有着普世性。^⑥ 他强调权力在维护正义中的不可或缺性,“权力在,正义在”。^⑦ 另一位犹太学者也说道:绝对缺乏权力甚至比拥有绝对权力有着更大的恶。^⑧

外部世界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冷漠和犹太人在纳粹屠犹中的孤立无援,被犹太学者一再提起。“六日战争”后,一位犹太知识分子这样评论道:“我们再次明白了一个古老的真理,就是只有自己才可依赖……只有自己才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⑨ “他人之善意无法信赖”的意识使得纳粹屠犹后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变成了锡安主义者,对以色列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大屠杀在肉体上几乎灭绝了欧洲犹太社团,却从精神上大大强化了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内部团结。当所有犹太人都为着民族的生存而殊死拼搏之时,犹太人内部各群体之间的差异、歧见、纷争就显得无关紧要了。^⑩ 希

① Elliott Horowitz, “‘They Fought Because They were Fighters and They Fought Because They were Jews’: Viol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Jewish Identity”, in Peter Y. Medding (ed.), *Jews and Violence: Images, Ideologies, Reali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2-23.

② Alice L. Eckardt,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Israel W. Charny (ed.), *Toward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on of Genocid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p. 188.

③ 二战前,流散地犹太人中主要存在两种犹太民族主义:一种为流散地民族主义,倾向于保持和发展流散地的犹太自治生活,并不主张回归巴勒斯坦;另一种为锡安主义,主张回归巴勒斯坦,重建犹太民族家园,实现犹太人社会生活的“正常化”。两者的共性在于都强调犹太人是一个民族,都推崇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的独立时代,都推崇古代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民族英雄马卡比(Macabees)。详见 Ezra Mendelsohn, *On Modern Jewish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9-20.

④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认为人性本恶,而且都推崇权力政治。详见王公龙:《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41—42页。

⑤ M. Ben Mollov, “The Jewish Experience as an Influence on Hans J. Morgenthau’s Realism”,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Spring, 2000.

⑥ (美)汉斯·摩根索著,肯尼思·汤普森修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⑦ M. Ben Mollov, “Power and Spirituality in the Thought of Hans J. Morgenthau”,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Spring 1998, p. 103.

⑧ Irving Greenberg, “Religious Values after the Holocaust: A Jewish View”, in Abraham J. Peck (ed.), *Jews and Christian after the Holocaust*,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2, p. 74.

⑨ Milton Himmelfarb, “In the Light of Israel’s Victory”, *Commentary*, Oct., 1967, p. 57.

⑩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7—289页。

特勒的反犹政策将犹太人中的自由同化主义者重新推回了犹太民族阵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看到,同化主义带给犹太人个体的是毫无意义的自由,却使整个民族遭受毫无意义的苦难。她呼吁犹太人回归民族,摆脱流散地受奴役、受压迫的贱民地位“只有在民族的框架中,人们才能作为众人中的一员而自由自在地生活。”^①正是这一回归民族的潮流,使锡安主义获得了广泛支持,也确立起以色列在流散地犹太认同的中心地位。

在犹太神学家那里,以权力维护民族生存被提到了神圣的高度。1967年春,年轻的犹太神学家艾米尔·法肯海姆(Emil L. Fackenheim)提出了一条被称为“犹太人的第614条戒律”^②的绝对律令:“真正的犹太人禁止给予希特勒死后的另一个胜利。他们必须作为犹太人活下去,以确保犹太民族不会消亡;他们必须记住奥斯维辛的受难者,以免记忆消失;他们不得对人类和世界绝望从而遁于玩世不恭或消极避世,以免这个世界重新落入制造奥斯维辛的力量之手;他们不得对以色列的上帝绝望,以免犹太教消亡。”^③这一“戒律”很快被人们简单理解成“犹太人需要首先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利益,即使以对他人的社会责任为代价”。^④另一位犹太神学家鲁宾斯坦(Richard Rubenstein)走得更远,他在1968年夏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上帝死了,犹太人想要生存于赤裸裸的权力和暴力仍然盛行的世界而不像欧洲犹太人那样自我毁灭,就必须“拥抱权力”。^⑤

“面对外部威胁,犹太人不应坐以待毙和仅仅停留于抗议,而应该起而战斗和反击”,这种行动主义精神在犹太人中间开始发挥重要影响。纳粹屠犹期间犹太人不抵抗,“像绵羊一样死去”成为反面历史教材,而华沙犹太起义者不畏强权的英雄气节则受到广泛颂赞。二战结束后,一些以反抗纳粹为题材的作品在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大受追捧。因“六日战争”而名声大噪的以色列将军摩西·达扬成为犹太民族英雄、新时代的“马卡比”,军人在犹太民族中变得更受尊敬。

除了意识层面的反思和反映,许多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实际行动积极回应纳粹屠犹。二战爆发以后,大量的犹太人积极加盟军和游击队,走上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据统计,有168.5万犹太人参加了盟国军队和游击队,还有许多犹太人积极参加地下斗争,为盟军收集情报、建立秘密交通线、破坏德军设施等;被关入集中营的身体虚弱、手无寸铁的犹太人也起而奋勇反抗,仅在东欧,就有20个隔离区和集中营爆发了中等以上规模的起义和暴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43年4月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大起义。^⑥

犹太民族迫切争取权力的斗争,也鲜明地表现为锡安主义运动急速兴起和美国犹太人政治行动主义猛烈升温。

二、锡安主义运动:从“防御精神”转向“进攻精神”

锡安主义运动致力于动员和凝聚犹太民族的集体意志,回归巴勒斯坦重建犹太民族的家园,以获得流散地难以实现的尊严、自由和正常的生活,塑造一种新的“希伯来人”形象。与同化主义或正统派的消极等待相比,这种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推崇英雄主义、行动主义,并将战士浪漫化,有着明显的权力倾向。但直到二战爆发,锡安主义运动在流散地犹太人中发展缓慢,仅仅吸引了少数人的

① Hannah Arendt, “The Jew as Pariah: a Hidden Tradition”, *Jewish Social Studies*, April 1944, pp. 121 - 122.

② 犹太教法只有613条律令。

③ Emil L. Fackenheim, “Jewish Values in the Post-Holocaust Future: A Symposium”, *Judaism*, Summer 1967, pp. 272 - 273. 两年后,他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详见Emil L. Fackenheim, “Jewish Faith and the Holocaust: A Fragment”, *Commentary*, August 1969.

④⑤ Michael E. Staub, *Torn at the Roots: The Crisis of Jewish Liberalism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3, 135.

⑥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57—158页。

支持“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犹太复国主义(即锡安主义——引者注)世界组织的经费预算比欧洲或美国任何一个较大的犹太社团的预算还要少”。^①

锡安主义本身混合了“理想的浪漫主义和实用的现实主义”,^②其对权力问题的认知深受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锡安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自由主义者往往相信锡安主义事业无须使用暴力或诡计,主张通过渐进、和平的移民和定居工作,逐步建成一个犹太新社会;精神锡安主义者注重犹太教伦理,主张锡安主义运动应致力于犹太民族的精神复兴、体现先知的正义与和平理想,谴责任何不符合犹太教精神的军事手段,反对复仇。^③以第二次“阿利亚”(Aliyah)^④为主体、主导着锡安主义运动的左翼劳工运动则在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进行综合与平衡。“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被看作是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同义词。人们用社会主义的目标来衡量民族主义的追求,用民族主义的策略来回答社会主义的思想。”^⑤所有上述派别均不承认或忽视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存在,甚至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垦殖将带来西方现代文明的福音。修正派领导人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较早就认识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存在,他相信阿、犹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在犹太定居点和它的敌人之间建立起一堵军事“铁墙”。^⑥他强调并推动建立犹太军队,要求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军国主义的论调长期处于锡安主义运动的少数派地位。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左派的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右派的亚博廷斯基都曾期望阿、犹之间能建立一种互惠关系。^⑦

在20世纪20—30年代,锡安主义运动中力量最强大的锡安工人党坚持一种温和、节制、渐进的“防御精神”(defensive ethos)。这一精神坚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有权定居、拓殖,并致力于稳步发展防卫力量以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军事优势,但不急于推出建立犹太国的最终目标。面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上升,锡安工人党强调犹太人的定居是和平建设新社会的进步事业,不仅不会压迫阿拉伯人,反而还会为阿拉伯人带来福祉;而且该党强调与阿拉伯劳工的阶级情谊和团结,对阿拉伯人的敌意采取克制态度,争取阿、犹民族之间的最终和解。但这种精神没有认清犹太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基本利益冲突,也忽视了两个民族运动争夺同一国家主权这一基本的冲突现实。虽然它已经认识到了潜在的阿、犹对抗,却认为阿、犹并不必迎头相撞。^⑧至于武力的使用,这种精神提倡“洁净武装”原则,主张不伤害无辜,也反对因发生过少量针对犹太人的武力袭击事件而让阿拉伯人承担“集体罪责”,以维护犹太武装的道义形象。^⑨从这一原则的表面看,它试图对军事权力的运用进行伦理限制,努力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进行平衡。^⑩20世纪30年代后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起义导致阿犹关系更趋紧张,该地区犹太社团力量的持续增长以及英国殖民当局限制移民的政策等因素也使强调自我克制的“防御精神”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和质疑,更多的人相信阿犹冲突难以和平解决,安全和防卫逐渐成为锡安主义运动的重心,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强行推进锡安主义事业的观点迅速抬头。在现实面前,锡安工人党的立场在向右转,建立国家的目标逐渐浮现出

① (美)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724页。

② Ben Halpern & Jehuda Reinharz, *Zionism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Society*, Hanover: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1.

③ Ehud Luz, “The Moral Price of Sovereignty: The Dispute about the Use of Military Power within Zionism”, *Modern Judaism*, Feb. 1987, p. 70.

④ 希伯来语原意为“上升”、“抬高”,特指犹太人移民故土居住、生活的行动。19世纪末至二战前夕,先后发生了五次“阿利亚”运动。

⑤ (英)诺亚·卢卡斯著,杜先菊、彭艳译:《以色列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4—295页。

⑥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The Zionist Resort to Force, 1881-19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56.

⑦ Ruth R. Wisse, *Jews and Pow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p. 131.

⑧⑨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The Zionist Resort to Force, 1881-1948*, p. 356; 252, 295.

⑩ Ehud Luz, “The Moral Price of Sovereignty: The Dispute about the Use of Military Power within Zionism”, *Modern Judaism*, Feb. 1987, pp. 74-77.

来,行动主义路线抬头,“进攻精神”逐渐领先于“防御精神”。

安置大量纳粹屠犹幸存者的紧迫性、英国殖民当局继续限制移民的政策以及阿犹大规模冲突的难以避免性,都使建立犹太主权国家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当希特勒加速对犹太人进行“最后解决”时,此前一直被束之高阁的建立民族国家的“最高纲领”于1942年在锡安主义阵营中赢得广泛支持,成了压倒一切的目标。纳粹屠犹致使锡安主义运动更加激进,锡安主义关于回归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的目标获得了犹太人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就连当时英国工党新任主席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犹太裔)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转向锡安主义。二战前他认为犹太人若失去自己的特性,那将是他们对人类做出的最佳贡献;但在1945年的一次演说中,他表示完全和坚决相信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复兴的必要性。^①

大屠杀带来的无助感和受害感使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自我正义感增强。他们更加确信,在为巴勒斯坦进行的斗争中,权利就在犹太人一边。锡安主义者长期以来对于阿拉伯人权利和需要的敏感性在紧迫形势下弱化,受害者意识为民族利益至上的立场大开绿灯。^②必须拥有强大的力量,并在巴勒斯坦成为强权,这成为锡安主义者从大屠杀中汲取的重要教训。年轻一代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战争的氛围中成长起来,他们崇尚积极进取,推崇行动主义,而不喜欢父辈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马萨达英雄主义神话^③成了他们思想意识的中心,也成为犹太青年教育的中心内容。大敌当前,许多犹太人积极加入英军,或加入左翼的“哈加纳”(Hagana)和右翼的“伊尔贡”(IZI)、“莱希”(Lehi)等犹太武装,还有许多人努力潜入纳粹占领区以动员身处绝境的欧洲犹太社团起而反抗,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在当时也广受推崇。本-古里安此时已经完全接受了亚博廷斯基的立场,他在演讲中不时援引纳粹屠犹这一悲剧,公开为犹太强权辩护。他说“如果德国知道犹太人也有权力,那么他们就不会都遭屠戮。”^④他决心以武力推进锡安主义事业,而不仅仅将武力限制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的防卫。这种民族主义立场提升了他的领导人地位,甚至右翼群体也愿意接受他。“伊尔贡”等右翼团体开始宣扬“武力万能”思想,将权力理解成狭隘的武力,其口号就是“独此一途”(Only this way);而左翼团体则推出了“还有此途”(Also this way)的口号,左翼团体重视武力,也重视建设、移民和定居。^⑤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武力都已经变成推进锡安主义事业的中心,而且对使用武力的道义限制也逐渐松动,“进攻精神”已经完全压倒“防御精神”。

针对英国殖民当局限制移民的政策,主张组织非法移民和武装抵抗的行动主义很快占了上风。1944年初,“伊尔贡”、“莱希”等右翼团体掀起了反抗英国托管的武装斗争,频频对英国殖民当局发动恐怖袭击。1945年10月,左翼团体“哈加纳”及其下属的“派尔马契”(Palmach)也投入反英斗争,与右翼团体一起开展“希伯来抵抗运动”。1946年12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22次锡安主义代表大会上,主张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坚持温和路线的魏茨曼(Chaim A. Weizmann)在本-古里安和西尔弗(Abba Hillel Silver,美国锡安主义运动激进派领导人)等激进亲美派的联合反对中下台,长达35年的“魏茨曼时代”结束。^⑥英、犹冲突全面升级,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的英国最终不堪重负,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

① (美)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第682页。

②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The Zionist Resort to Force, 1881-1948*, p. 325.

③ 马萨达(Masada)是死海边一处险峻的山地要塞。公元70年,近千名陷入重围的犹太起义者据守此要塞英勇抗击罗马大军,最后集体自杀。

④ 转引自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The Zionist Resort to Force, 1881-1948*, p. 293.

⑤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The Zionist Resort to Force, 1881-1948*, pp. 349-350.

⑥ 张倩红:《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5页。

在阿、以之间频繁的武装冲突中,以色列建立并壮大起来,成为中东地区的强权,但始终难以摆脱纳粹屠犹的阴影。对灭绝的恐惧和对权力的依赖在以色列人的集体心理中形成某种相互关联的均衡,并随着安全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一旦安全形势恶化,以色列就会以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方式应对。^① 受困状态和马萨达式的“围困心理”使以色列建国以来一直寻求“绝对安全”,将安全事务置于其他任何事务之上,并以一种“泛安全化”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事务。以色列还信奉安全事务中“武力万能”的思想,长期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发展尖端军事技术和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尽管以色列也将获得美国等大国的支持视为保障自身安全的关键,但它一直难以建立对外部世界的信任,“自助”意识仍然在其安全范式中居主导地位。^② 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使以色列对任何安全威胁高度敏感,倾向于以“先发制人”的战略打击潜在的敌人,并经常对阿拉伯人的非对称抵抗采取“集体惩罚”。虽然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并未能弥合纳粹屠犹带来的心理创伤。相反,以色列人由“思甜”转向“忆苦”,将纳粹屠犹中犹太人在无权状态下的悲惨命运融入他们的集体记忆和认同之中。纳粹屠犹进一步成为以色列增强权力、维持以强权对待他民族的合法性依据。外国名流访问以色列时总是会被带去参观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博物馆(Yad Vashem),该博物馆的接待者会向来宾提供一种非常典型的解说“如果那时有一个犹太国,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们从大屠杀中学到的教训就是处于人类边缘、虚弱不堪、依赖他人意味着什么?”^③ “六日战争”后兴起的犹太极端宗教民族主义者甚至拒绝了“洁净武装”原则和相关国际公约对使用武力的限制,也无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基本权利。^④

三、美国犹太人的政治行动主义

在纳粹屠犹发生之前,美国犹太社团并不具备领导世界锡安主义的政治能力,还未成为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在二战初期的几年里,与美国的爱尔兰、意大利等族裔群体相比,美国犹太人承担公职、参与政治的比例相当低。^⑤ 当时,熟悉并适应美国的政治机制和政治文化、融入主流社会是美国犹太社团的主要目标。美国犹太人内部因为教派、来源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而分歧重重,近乎无组织状态,并不存在能充分动员犹太大众的政治共识和领导机制。他们还被指控为支持布尔什维主义,面临来自许多群体的反犹主义偏见。^⑥ 改革派是美国犹太人中最强大的群体,但直到1937年,该派一直坚持1885年“匹兹堡纲领”确定的反民族主义(反锡安主义)路线,强调对美国的唯一忠诚,担心遭到“双重忠诚”的指控。面对锡安主义兴起带来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占据了犹太社团领导地位的改革派领导人^⑦ 往往以自由主义消解其特殊民族主义的成分,他们尤其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⑧ 他们倾向于以自由主义方式解读和实践锡安主义。

① Erel Shal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ression and Fear of Annihilation in Israel”, *Political Psychology*, September 1994, pp. 415 - 434.

② Uri Bar - Joseph, “Towards a Paradigm Shift in 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ion”, *Israel Affairs*, Spring/Summer 2002.

③ Leonard Fein, *Where are We? The Inner Life of America’s Jew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8, p. 61.

④ Ehud Luz, “The Moral Price of Sovereignty: The Dispute about the Use of Military Power within Zionism”, *Modern Judaism*, Feb. 1987, pp. 84 - 86.

⑤ Daniel J. Elazar,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Notions of American Jews: Converg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The Jew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December 1966, p. 18.

⑥ David H. Shpiro, *From Philanthropy to Activism: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Zionism in the Holocaust Years, 1933 - 1945*,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4, Introduction, XXV.

⑦ 重要领导人有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普罗斯考尔(Joseph M. Proskauer)、怀斯(Steven S. Wise)拉比等。

⑧ Jerold S. Auerbach, *Rabbis & Lawyers: The Journey from Torah to Constit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72 - 173.

在他们那里,犹太宗教原则被解释为符合林肯精神;锡安主义被视为符合《独立宣言》的核心原则,意味着将“美国梦”贩卖到巴勒斯坦。^①美国犹太人对锡安主义的支持也主要表现为一种慈善行动,他们为巴勒斯坦事业捐款,但很少有人去那里定居。

二战期间欧洲犹太社团遭遇灭顶之灾,使维护犹太民族生存权利尤其是领导锡安主义运动的主要责任自然地转向仍然强大的美国犹太社团。坏消息从欧洲滚滚而来,这使美国犹太人深感焦虑和惊恐。他们既为欧洲犹太同胞的生死存亡而担忧,也为自己在美国的命运而疑虑。在世界各国纷纷对犹太难民关闭大门的情况下,巴勒斯坦成为接纳和救助欧洲犹太人的希望之地。纳粹的暴行表明,即使在德国那样曾被认为拥有高度文明、犹太人也已经成功融入社会的国家,犹太人也难以避免种族灭绝的命运。那么,世界上究竟还有什么地方是真正安全的?答案也只能是巴勒斯坦。许多美国犹太人以支持锡安主义来回应希特勒的暴行,锡安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到二战爆发时,在美国亲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已呈压倒之势,而过去美国犹太人大多对锡安主义运动一直漠不关心,甚至采取敌视态度。^②从1932年到1939年,美国锡安主义组织成员从8400人跃升为43000人,到二战结束时达到了20万人;巴勒斯坦联合劝募会(Palestine United Appeal)寄到巴勒斯坦的资金在1932—1938年间几乎增长了7倍。^③改革派也在1937年制定的“哥伦布纲领”中将犹太人的民族性概念注入其意识形态,并公开表明他们支持锡安主义的态度。^④但此时美国锡安主义者对救助欧洲犹太同胞几乎毫无作为。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中有许多犹太裔高官,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与怀斯拉比等一些犹太精英的关系也很密切,但这些新权贵在缺乏犹太社团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倾向于依托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紧密关系开展幕后游说。他们主张温和节制,反对高调的行动主义路线,更不愿公开烦扰和顶撞罗斯福;他们难以克服双重认同带来的内心矛盾,也难以摆脱作为犹太人而产生的不安全感。

1942年,希特勒实施“最后解决”的消息频传并得以确认,绝望中的美国犹太人对英国政府继续关闭巴勒斯坦大门和美国政府无所作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愤怒,激进的政治行动主义迅速抬头。修正派的柏格森(Peter Bergson)及其建立的“争取建立犹太军队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Jewish Army)为建立犹太军队而在美国积极呐喊。他们的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军问题开始频繁出现在锡安主义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的议程中。在1942年5月召开的巴尔的摩会议上,美国锡安主义者通过了“八点纲领”,重申坚决反对英国托管当局限制移民的政策,并要求承认犹太人(包括在犹太旗帜下的犹太军队)在保卫国家的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权力。最重要的是,本-古里安提出的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最高目标,也直白地在该纲领中提出来了,并在当年11月被锡安主义行动委员会接受,成为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中心目标。^⑤

建立犹太国的要求显然不利于英国和美国安定阿拉伯人以争取二战尽快胜利的目标。为遏制锡安主义激进化,1943年英、美两国政府试图发表一个倾向于维持巴勒斯坦当时政治状况的联合宣言,而且还要求怀斯拉比等温和的改革派领袖阻止把“建立犹太国”纳入将于是年8月召开的“美国犹太人联合会”(American Jewish Conference)^⑥首次会议的议程。听闻英国和美国将出台不利于建立犹太国的联合宣言,美国的锡安主义者迅速行动起来向罗斯福总统以及国务院施压。

^① Jerold S. Auerbach, *Are We One? Jewish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66-68.

^{②③} (美)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第668、667页。

^④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著,傅有德等译:《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2页。

^⑤ (美)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第663—665页。

^⑥ 该联合会成立于1943年,旨在表达美国几十个全国性和地方性犹太人组织的共同立场,以解决欧洲犹太人的政治问题。

1943年7月23日,怀斯拉比致信罗斯福,称“任何坚持或呼吁避免公开讨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诉求和希望的决心,都将激起全国犹太人的抗议并在整个英语世界引起回响”。^①犹太代办处(The Jewish Agency)^②政治部领导人摩西·夏里特(Moshe Shertok)也于7月30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声称“如果决定维持一个在他们看来残忍而有失公正的政策,巴勒斯坦犹太人将极为愤怒,并可能会实行绝望的行为”。在锡安主义者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政府中的犹太裔高官亨利·摩根索(Henry Jr. Morgenthau,时任财政部长)、萨缪尔·罗森曼(Samuel Rosenman,罗斯福的助手和演讲撰稿人)等人联合向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施压。英、美发表联合宣言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③参加8月召开的美国犹太人联合会会议的犹太领导人原先有一个采取温和立场、不讨论争议话题(即前述巴尔的摩会议通过的纲领中提出的建国问题)的“君子协定”,西尔弗也被排斥在发言名单之外。但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大会决定给予西尔弗一个发言机会。而西尔弗要求建立犹太国的发言完全打乱了会议计划,结果建立犹太共和国的动议在会议表决中以压倒性多数赞成而获得通过,^④以西尔弗为首的激进行动派战胜了温和派。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的问题,美国犹太人第一次历史性地与美国行政当局迎头相撞,并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使犹太人充分认识到公共舆论施压的有效性和协调行动的重要性,也使他们增强了对抗政府的勇气,并进一步确立起行动主义路线。

西尔弗于1942年8月担任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设两位主席,另一位主席为怀斯拉比),并任美国锡安主义组织政治委员会领导人。他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改造“紧急行动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拥有强大草根支持的政治压力集团。在他的建议下,“紧急行动委员会”改名为“美国锡安主义紧急行动理事会”(American Zionist Emergency Council),理事会由26名理事和12名执委组成,下设十几个分委员会和部门,并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华盛顿局”(The Washington Bureau)。改组后的“紧急行动理事会”成为一个职权明确、功能齐全、专家领导、富有战斗性的组织,它既能有效地开展草根动员和舆论制造,也能有效地向精英们游说。美国锡安主义运动从此由慈善事业转变为承担政治责任、施加政治压力的政治事业,不断公开与英、美两国政府发生冲突。改造后的组织迅速膨胀,工作成效显著。从1943年初至1944年初,积极为锡安主义奔走努力的人就从几十人猛增至数千人;由于其下属的“社团联系委员会”的出色工作,美国有39个州的议会和数百个城市的理事会都通过了支持锡安主义的决议。^⑤为实现“巴尔的摩纲领”,该理事会利用美国政体分权制衡的特征,通过动员家乡选区选民以及与议员建立直接联系向民主、共和两党政要施压。该理事会还利用1944年美国的大选,积极争取两党对锡安主义事业的支持。在以色列诞生的关键时期,锡安主义者进一步加强了对美国政要的游说和施压。^⑥当1948年锡安主义者将巴勒斯坦问题递交美国国会后,535名众议员中的411名投票支持建立犹太国。^⑦“紧急行动理事会”成为美国犹太人政治生活中最重要和最有效的组织,成为美国犹太人参政的典范,并在发展

^① David H. Shapiro, *From Philanthropy to Activism: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Zionism in the Holocaust Years, 1933-1945*, pp. 140-141.

^② 犹太人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加强世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③④⑤} David H. Shapiro, *From Philanthropy to Activism: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Zionism in the Holocaust Years, 1933-1945*, pp. 140-141; 142-143, 133; 152-153.

^⑥ 激进锡安主义者领导人在联合国讨论分治决议前夕向白宫发起强大的政治和宣传攻势,对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纠缠不休”,甚至“政治威胁”,让杜鲁门感到不安和恼火。杜鲁门回忆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受到像这次这么厉害的针对白宫的压力和宣传。”分治决议通过后,他们又纷纷向杜鲁门提出要求,而且往往用一种“言词激动”的“吵嘴”方式,使得杜鲁门相当反感,甚至拒绝接见德高望重的温和派锡安主义领导人魏兹曼。详见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96、198页。

^⑦ David H. Shapiro, *From Philanthropy to Activism: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Zionism in the Holocaust Years, 1933-1945*, p. 152.

过程中完善了种种增强政治影响的策略和技能。政治行动主义也开始在美国各犹太社团中扩展,犹太人开始卷入或组建各种组织,参与政治,许多人将政治作为犹太认同的新基础。犹太人从此开始在美国真正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势力。

纳粹屠犹对美国犹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1945年到1967年是美国犹太人的“黄金时期”,他们加速融入主流社会。但是,“六日战争”又重新在美国犹太人中唤起了纳粹屠犹带来的无权感和无助感,它甚至将自由派犹太机构都转变成了民族主义的防卫组织。以色列在战场上显示出来的强大实力带给他们强烈的自信与自豪,并成为他们的信心和力量之源。大屠杀和以色列安全这两个问题很快替代民权事业,在美国犹太人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成为他们的“公民宗教”。^①带有明显保守色彩尤其是致力于维护与加强美以特殊关系和以色列安全的组织进一步壮大起来。面对反犹分子的袭击,美国犹太人还开始模仿黑人民权运动中的激进派别进行武力防卫。1968年正统派拉比卡亨(Meir Kahane)成立了极右翼组织“犹太防卫联盟”(Jewish Defense League)。该组织的宣传册就以一幅犹太幼童在纳粹的枪口下举着双手战战兢兢前行的图片为封面,图片下方写着“永不再现!”(Never Again!)。^②“六日战争”后强势崛起的新保守派也将纳粹屠犹的教训转化成了获取权力以维护犹太民族(尤其是以色列)安全的动因。对他们而言,纳粹屠犹是民族生活中的事实,而军事和政治权力则是确保民族生存的关键,因此,政治行动主义和拥有权力就不仅合法,而且必要。^③他们深知美国对于以色列安全的重要性,并断言美国的全球利益和犹太民族的总体利益以及以色列的特殊需要相一致。他们崇拜美国强权,推崇以色列运用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等策略。

在美国,随着受害者文化取代了二战后初期的强者文化,美国犹太人将纳粹大屠杀描绘成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强调其独特性和不可比性,以防来自其他群体对“最大受害者”身份的竞争。^④而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有意识地将以色列局势置于纳粹屠犹的框架下加以解读和阐释,给难解难分的中东冲突以纳粹时代的道德澄清。^⑤犹太人利用历史悲情增强了民族认同和凝聚力,并以之为依据对任何针对以色列强权的道义挞伐进行道义反击。美国犹太人充分利用其制造舆论的强大能力,有意识地在犹太社团和美国社会中扩大关于纳粹屠犹的历史记忆。纳粹屠犹的历史记忆本身成了美国犹太社团获取道义资本、增强政治权力的工具。

四、余论：以道德节制权力

纳粹屠犹带来的生存危机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阴影,使犹太民族转向了民族主义,转而努力增强本民族的政治权力。它造就了当今犹太民族“一个精神中心(以色列)、两个权力支柱(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团)”的政治格局。犹太民族已经摆脱了无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了强权民族。一些犹太民族主义者已经陷入对权力的痴迷,但是犹太民族内部从来没有丧失权力问题上的道义敏感性。民族主义者拥抱权力、走向强权的过程也时常在犹太人内部遭遇道义挞伐。

^① Jonathan D. Sarna, *American Judaism: A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07.

^② Michael E. Staub, *Torn at the Roots: The Crisis of Jewish Liberalism in Postwar America*, p. 226.

^③ Yosef Gorny, *The State of Israel in Jewish Public Thought: The Quest for Collective Ident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9.

^④ 在卡特政府决定设立“美国大屠杀纪念委员会”后,关于“纳粹大屠杀”受难者究竟应该为包括其他族裔群体的1100万人,还是仅指600万犹太人,这个问题在犹太人与其他族裔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议;在主张后者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委员会和主张前者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以及卡特政府之间也存在不同意见。最后,“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采用了倾向后者但兼及前者的表述。详见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Mariner Book, 2000, pp. 215 - 220.

^⑤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p. 165.

前面已经论及,锡安主义阵营内部各种派别的理想主义者都试图以不同的伦理观来节制民族主义和权力,尽管纳粹屠犹使得建立国家和拥有权力有了现实的紧迫性,但关于权力的论争和矛盾一直存在。“六日战争”后,右翼宗教-民族主义势力的迅猛抬头无论在以色列左派中还是在美国犹太自由派中都引起了严重不安。由阿莫斯·奥兹(Amos Oz)和约西·伯林(Yossi Beilin)等领导的和平运动(Peace Now Movement)一直反对右翼的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立场,要求尽快结束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土地的不义占领,与阿拉伯人实现妥协与和平。如约西·伯林认为,以色列1967年后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控制在许多方面违反了“洁净武装”原则。^①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颇有影响的“后锡安主义”(Post-Zionist)知识分子群体走得更远,他们致力于“解构”锡安主义的“正当性”神话。后锡安主义者将锡安主义视为一种以武力盗取另一民族的土地并继续压迫他们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罪恶现象。^②这种立场无异于宣布以色列建立在“原罪”之中。有的人甚至认为“六日战争”乃是以色列历史性的政治灾难,犹太民族重掌政治权力乃是一场人类和道德的灾难。^③一些犹太学者出于对滥用权力之危险性的认识,抨击过分渲染纳粹屠犹之历史悲情的做法。一种典型的表述就是“记忆在群体意识中的角色必须慎重考虑。……如果我们通过将纳粹屠犹变成犹太人标记性的体验,恭敬地接纳他(法肯海姆——引者注)关于我们自身为受厌憎的贱民的定义,那将成为希特勒死后更大的胜利。”^④

许多犹太政治评论家和神学家都看到了权力的有限性和双重性,对权力万能主义进行抨击,并为当今犹太人沉迷于权力而担忧。当代著名的犹太政治学家丹尼尔·埃拉泽(Daniel J. Elazer)如此论述“权力似火,权力并不道德。……它可以用于善,也可以用于恶。它可能被很好地掌控和使用,也可能失控和滥用。”^⑤他告诫犹太人不可为权力迷醉,因为每次高估自身的力量,犹太民族都走向了民族灾难。他号召“让我们千方百计保持甚至提升我们的权力地位,但我们也要始终冷静、负责地对待权力,以使新犹太政治……成为一种审慎的政治。”^⑥

Abstract The Holocaust is a turning point on Jew's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power cognition, many Jewish politicians and theologians were hence diverted to Zionism as a realistic choice to safeguard the security of the Jews. The Holocaust also diverted American Jews from liberal assimilationists to Zionists. Among them, the radical political actionist took the place of the moderate conservatives quickly and transformed 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into a powerful political group.

(汪舒明,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上海,200020)

(责任编辑:丁克定)

① Yossi Beilin, *Israel: A Concise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 139.

② Meyrav Wurmser, "Can Israel Survive Post-Zionism?", *Middle East Quarterly*, March 1999, p. 4.

③ Michael Prior, *Zionism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A Moral Inqui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241, 245.

④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p. 281.

⑤ Daniel J. Elazar, "The Dilemmas of Morality and Power: A Last Word", in Daniel J. Elazar (ed.), *Morality & Power: Contemporary Jewish Views*,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p. 144.

⑥ Daniel J. Elazar, "The New Jewish Politics", in Daniel J. Elazar (ed.), *The New Jewish Politics*,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p. 12.